杨扬 陈引驰 傅杰 选编

文人自述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

杭州大学出版社

文人自述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

杨扬 陈引驰 傅杰 选编

杭州大学出版社

选编缘起

临近世纪末，人们不约而同希望对这个行将过去的世纪作一回顾，以便为新世纪的来临，积累宝贵的经验。于是，各种回顾本世纪思想文化历程的书籍陆续出版，蔚为大观。这些书籍，对于总结过去，丰富未来的精神文化，是一件好事。作为人文学术的研究者，我们关心这种文化总结工作，也愿意作出自己的努力。

我们选编这套“20世纪名人自述”丛书，是希望通过这些在文化、学术和文艺领域取得过突出成就的文化名人的自述，了解他们各自对本世纪社会人生的看法。这些自述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经验、创作道路、生活经历乃至情感体验，其笔触丰富多变，或细腻入微，或奔放洒脱，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人格。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抑或扩展个人视野角度看，都将给读者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本丛书选取了一百二十余位名人的自述，写作年代或早或晚，经历也各各不同，选编主要着眼于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成就。同时，考虑到选编的时间跨度比较大，为了保持原作风貌，对不同的行文习惯造成的差异，仅从体例上作了少量的技术处理。

将散见于各个时期报章杂志、书籍中的名人自述收集起来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限于各种条件，也限于我们的水平，只能选编成目前这个样子，希望将来能有更好更全的选本问世。

编　者

1997年7月于上海

目　录

包天笑：在《小说林》…… 1
鲁　迅：《呐喊》自序 …… 7
周作人：复辟前后…… 12
郭沫若：学生时代(节选)…… 20
陈衡哲：我幼时求学的经过…… 43
叶圣陶：略　叙…… 52
林语堂：圣约翰大学…… 54
郁达夫：水样的春愁…… 59
茅　盾：革新《小说月报》的前后…… 65
徐志摩：自　剖…… 84
许钦文：稽山鉴水间…… 90
庐　隐：大学时代…… 98
丰子恺：我的苦学经验 …… 108
朱自清：我是扬州人 …… 119
闻一多：自　传 …… 123
老　舍：三年写作自述 …… 124
苏雪林：我写作的动机和经过 …… 134
夏　衍：两个口号的论争 …… 138
冰　心：我的童年 …… 156
曹聚仁：我的读书经验 …… 165
废　名：我怎样读《论语》…… 169

沈从文： 水　云(上) …… 172
阳翰笙： 回忆上海大学 …… 193
聂绀弩： 自　传 …… 214
梁实秋： 清华八年(节选) …… 216
巴　金： 文学生活五十年 …… 229
朱　湘： 我的童年 …… 240
丁　玲：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…… 249
施蛰存： 《现代》杂忆 …… 267
楼适夷： 零零碎碎的记忆 …… 298
冯　至： 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 …… 316
韩侍桁： 我的经历与交往 …… 323
萧　乾： 给自己的信 …… 346
徐懋庸： 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 …… 364
艾　青： 我的创作生涯 …… 382
曹　禺： 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…… 392
萧　红： 我之读世界语 …… 416
何其芳： 梦中道路 …… 418
陈荒煤： 奔向延安 …… 423
孙　犁： 文字生涯 …… 436
叶君健： 去国行 …… 441
张爱玲： 私　语 …… 462

包天笑

在《小说林》

包天笑(1876—1973),原名包天毅,江苏吴县人。通俗文学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钏影楼回忆录》等。

在报馆里编新闻,於每日的时间,很有关系。编要闻,时间最晚,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。那种专电,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,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,也说不定。为什么这样迟呢?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,如一等电、二等电是官电,民间不许通行;三等、四等电,方是民电,又称为急电,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(及至民国成立以后,乃规定有新闻电,以便利报界。四等电每字一角,新闻电特别便宜,每字仅三分)。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,继发民电,然后方发新闻电,即各报馆的专电了。

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(他的夫人故世后,其时尚未续弦),不必深夜归家,那便利得多。还有报纸全部排好,拼成版子,将要开印的时候,还要仔细看一遍,有无错误,这叫做"看大样"。大概看大样的事,属于总编辑的,也是在深夜最迟的,但罗孝高不来,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,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,景韩也就看看了。

本埠新闻的编辑,比较要早得多,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,访稿全都来了,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。如果在九点钟以后,发生了特别事故,有重要新闻,明晨必须见报的,当然可以加

入,其余的琐闻细事,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。至于编外埠新闻的,更要早一点。从前还没有快信、航邮,下午五点钟以后,邮差不再送信了,把当日所到的信,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,发清了稿子(有的须要修正一下),就没有你的事了。

刚到上海,住在旅馆里,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,便是商量请我到"小说林编译所"去。单写小说,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,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。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,那就非去不可了。因为《小说林》登报征求来的稿子,非常之多,长篇短篇,译本创作,文言白话,种种不一,都要从头至尾,一一看过,然后决定收受,那是很费工夫的事。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,它的情节、意旨、结构、描写都很好,而文笔不佳,词不达意,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。

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,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,再接受《小说林》的事。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,住在旅馆里,纷乱如麻,未能决定。及至时报馆事定局了,我觉得反正上半天没有事,便接受《小说林》的事。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,星期休假(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),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,我也很为满意。我有了时报馆的八十元,再加上《小说林》的四十元,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,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,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,不是很有余裕吗?

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。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,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,后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,许多人才知道了。这个时候,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,都写了信来,还有自己来造访的。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《小说时报》,本来是陈景韩编的,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,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,但稿费却照算的。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《新新小说》,吴趼人编的《月月小说》,我都写有小说稿子,此外什么小说杂志记也记不清楚了。

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,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,这一级的小说,已不需修改的了。也有每千字一元的,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,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,但是许多出版家,贪便宜,杀穷鬼,粗制滥造,也是有的。更有一些穷文人,为了生活所迫,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,但深入窘乡时,也不待善价而沽了。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君,他从日本回国时,写了一部《留东外史》,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,到上海来,兜来兜去,这些书贾,以为其人不见经传,无人肯要,就是以每千字五角,卖给某书贾的。谁知后来销数甚佳,却赚了不少钱。

我的小说,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,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(按,此一笔稿费,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,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,我亦允之,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),这算是特别优待。但在时报馆(有正书局)及《小说林》两个基本地方,仍作每千字两元算。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,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,但林先生不谙西文,必须与人合作,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,五元之中,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,亦不过千字三元(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)。

这时候写小说,以文言为尚,尤其是译文,那个风气,可算是林琴翁开的。林翁深于《史》、《汉》,出笔高古而又风华,大家以为很好,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。后来到"五四"时代,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、胡适之辈,所译写的短篇小说,也是用文言的,其余的更不必说了。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,每回都有回目,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,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。

所以曾孟朴的《孽海花》,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,而是以白话文写的。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,常常是用北京话,而在京话的对白中,却要说得漂亮,简捷俏皮,好在他是住过北京的,可以对付。不过他的《孽海花》实在写得太慢了。在《小说林》杂志上预

告，每期可以登一回（《小说林》是月刊），但他还是常常脱期，即使不脱期的话，每期登一回，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，也须六年又八个月，可谓“长线放远鹞”了。

孟朴的写小说，正与我相反，我是写了下来，不加修饰，并且不起第二回稿，以前写制艺文、叙事文，都是如此。直到如今，有好多小说，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，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。我想：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懒性，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？孟朴却不然，他是句斟字酌，改了又改，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，从新再做起来，也是有的。可是错误还是有的，因为《孽海花》不是虚构，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。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，全在夜里工作，至少要到半夜，时常至于通晓，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，他独居在《小说林》编辑所的楼上，他的家眷都不在此。

他的有烟霞癖，为了他的多病，他在《孽海花》小说上的笔名，不是叫做“东亚病夫”吗？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，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，起身以后，便与“阿芙蓉”为伴。

我每天到《小说林》去是在上午，那个时候，他正是“春眠不觉晓”，在他的黑甜乡里，不便去惊动他。要去访他，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，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，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，也不算一回事。

在《小说林》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个志愿，可惜到后来，这个志愿，一个都没有偿。因为孟朴说：他的《孽海花》，写到庚子拳变，两宫回銮以后，就结束不写了，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，也就无关紧要了。因此徐念慈（《小说林》总编辑）说：“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。”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，又称为马贼，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，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，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，正在搜集材料。他说：“这部小说，正好接在《孽海花》之后，可以出版。”

我说：“我想写革命事迹。”当时革命党东起西应，排满风潮热烈。恰有徐锡麟、秋瑾的一件事发生，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

一人,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,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。书名也已拟好了,叫做《碧血幕》,并且在《小说林》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,后来《小说林》杂志不出版了,我也就此搁笔了。

孟朴的《孽海花》始终没有完篇,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,倒也风行一时。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,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,然而核对事迹,一望而知。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,第一,他的老岳丈汪柳门,便不以为然,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,尤其苏州人中,如陆凤石、汪芝房、叶鞠裳等,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。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,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?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?(旧回目中,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)这时他们又搞什么"宏文"馆,编什么《博物大辞典》,那时我已不在《小说林》了。总之资本已经蚀光,关门大吉。

这以后,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。辛亥以后,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,他是什么水利局长、财政厅长,闹了一下子,我也弄不清楚,其实吏事非其所习,他是一个文学家呢。

到1927年,他官又不做了,他的大公子曾虚白,从法国留学回来,在上海开了一家"真美善书店"(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),又出了《真美善》杂志,《孽海花》又写了十余回,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,那一个回目是《青阳港·好鸟离笼》,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。

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,可怜他并不曾着笔,便这样赍志以没了。我的《碧血幕》,也不曾继续写下去,后来便是辛亥革命,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,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。但我对于这个志愿,当时总搁在心头,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,为书中的主角,以贯通史实,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,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,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。

直到民国七八年间,我在北京,和张岱杉先生(名弧,别号超观,绍兴人,曾一度为财政部长,是前清举人)谈起此事,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,他提醒我道:"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,你没有留

意吗?"我问是谁? 他说:"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,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,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?"我被他提醒了,大为称善,于是我便写了《留芳记》,但也只写了二十回,给林琴南先生看过,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,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关于写《留芳记》的事,我后将再述。

在从前以一个文人,办点商业性质的事,终究是失败的多数。《小说林》也是如此,虽然所出的书,倒也不少,销路也不差,还是亏本。譬如说:放出的帐,收不回来;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;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,尤其是小说。他们是自办印刷所、排字房的,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,都是拆了版子,不归原位,倾弃在那里,只好作为废铅卖了。诸如此类,都是吃了人家的亏。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,他们两位,狄楚青与曾孟朴,都是公子哥儿呀!

鲁　迅

《呐喊》自序

鲁迅(1881—1936),原名周树人,浙江绍兴人。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、思想家。1917年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现代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自此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。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,后来大半忘却了,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,虽说可以使人欢欣,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,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,又有什么意味呢,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,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,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,曾经常常,——几乎是每天,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,年纪可是忘却了,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,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,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,在侮蔑里接了钱,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,又须忙别的事了,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,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:冬天的芦根,经霜三年的甘蔗,蟋蟀要原对的,结子的平地木,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,我以为在这途路中,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;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,仿佛是想走异路,逃异地,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,办了八元的川资,

说是由我的自便;然而伊哭了,这正是情理中的事,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,所谓学洋务,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,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,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,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,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,在这学堂里,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,算学,地理,历史,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,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,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,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,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;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,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,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,预备卒业回来,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,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,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,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,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,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,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,而时间还没有到,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,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,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,我在这一个讲堂中,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,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,一个绑在中间,许多站在左右,一样是强壮的体格,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,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,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,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,我已经到了东京了,因为从那一回以后,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,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,

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,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,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,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;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,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,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,商量之后,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,名目是取"新的生命"的意思,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,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,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,接着又逃走了资本,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,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,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,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,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,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;后来想,凡有一人的主张,得了赞和,是促其前进的,得了反对,是促其奋斗的,独有叫喊于生人中,而生人并无反应,既非赞同,也无反对,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,无可措手的了,这是怎样的悲哀呵,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,如大毒蛇,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,却也并不愤懑,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,看见自己了: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,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,来麻醉自己的灵魂,使我沉入于国民中,使我回到古代去,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,都为我所不愿追怀,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,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,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,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,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,而这屋还没有人住;许多

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?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?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

候仍不免呐喊几声,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,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,是可憎或是可笑,那倒是不暇顾及的;但既然是呐喊,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,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,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,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,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,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,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,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,也就可想而知了,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,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,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,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,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,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,而且付印了,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,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1922 年 12 月 3 日,鲁迅记于北京

周 作 人

复辟前后

周作人(1885—1968),字启明,号知堂,浙江绍兴人。以散文创作最有成就。"五四"时期发表《平民的文学》、《人的文学》,从此蜚声文坛。本篇选自《知堂回想录》。

112 复辟前后(一)

我来到北京,正值复辟的前夜,这是很不幸的事情,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,因为经历这次事变,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,有思想革命之必要。当时袁世凯死了,换了一个全无能力的黎元洪当大总统,一切实权还在北洋军阀的手里,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,正是袁世凯的头号伙计,因此府(总统府)院(国务院)两方面的冲突,是无法避免的。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,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,他们逐渐的结合起来,联合所谓"督军团",与当时的中央政府相对立了。我在北大庶务课所看的《公言报》、《顺天时报》上的时局消息,便都是关于这一件事。《公言报》是他们的机关报,《顺天时报》则是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,一向是幸灾乐祸,尤其是颠倒黑白,没有什么好话了。督军团的首领是有名的两个坏人,即是徐州的张勋和蚌埠的倪嗣冲。倪嗣冲已经够反动的了,张勋更是不法,自己做了民国的官,却仍以前清遗老自